

宋代小说思想三题

李军均 曾垂超

宋人“始有意治小说”^①，其小说思想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唐传奇的产生，促进宋人有意从事小说的阐释，他们将小说地位抬高到“九流”的一种，视为“圣人之道”，在重视小说本体性时致力阐发小说的“德性”自觉。此外，宋人以艺术精神探寻小说的文学之美，并因小说的文学审美本质而形成“荟萃小说”的社会风尚，同时在认可娱乐性思想的同时，突破史学视野下的“实录”传统，开启了中国小说的近代性思维。

一般而言，小说批评和小说理论的发生落后于小说创作，中国古代以序跋、评点、笔记等存世的小说理论和批评尤其如此，但小说思想则随创作而发生，甚至先于创作。在宋代，有御敕编纂小说集《太平广记》、欧阳修编纂《新唐书》与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或取资小说^②。钱惟演谓：“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③这皆说明宋人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小说的文化地位。唐文言小说蔚为大观的成绩，促进宋人对小说现象和小说本体艺术规律的探寻，即从文化视角探讨小说的价值，以史学思维探讨小说的虚构与真实，立足文学本位探讨小说的艺术性。宋代小说思想，既继承汉唐的传统思想，又有极大突破，可视为中国小说思想近代化的开端。

一、“鉴照古今”与“奖善黜恶”——宋人小说文化观

在古代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④，《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皆将小说附于子部九家，将小说排斥于“圣人之道”外，宋代以《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为代表的正统目录学，亦是如此。然而宋代目录学并不能代表宋人对小说的全部文化定位。目录学之外，宋人多有将小说纳入九流的正统定位并赋予小说“德性”的自觉，宋初李昉编撰《太平广记》尤具垂范意义。

《太平广记》对小说“德性”自觉的垂范,集中体现在李昉所进《〈太平广记〉表》中,内云:“伏以六籍既分,九流并起,皆得圣人之道,以尽万物之情,足以启迪聪明,鉴照今古。”^⑤何谓“六籍”?《文选·班固〈东都赋〉》云:“盖六籍所不能谈,前圣靡得言焉。”李善注曰:“六籍,六经也。”^⑥何谓“九流”?《汉书》卷一〇〇下《叙传》云:“刘向司籍,九流以别。”^⑦九流即战国时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农、杂九家。在传统学术中,汉唐小说家不仅不能厕身“六籍”、“九流”之列,甚而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李昉向宋太宗进《太平广记》,以之为“六籍”、“九流”承绪,无疑已突破《汉书·艺文志》所谓“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⑧的学统定位,从而为小说存在的合理性建立了相应的谱系。李昉以小说为“六籍”、“九流”之承绪,盖因他认为小说生成发展的知识基础是其能得“圣人之道”,即承载“人道”、“天道”,故尔能烛幽显微,“尽万物之情”。如此,则小说不再“致远恐泥”^⑨,而是既可同经书一样“启迪聪明”,亦可如史书“鉴照古今”,此种观念为小说在正统观念笼罩下的传播与接受提供了必要的知识空间。

《太平广记》的成书,具有帝王之学的文化范式和“小说之渊海”的文献功能。作为帝王之学的《太平广记》,其编撰目的乃是张扬宋初统治者的“尚文”举措,因而在宋代即与《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合称为“四大书”^⑩。李昉主持编撰与进呈《太平广记》皆在宋太宗朝。宋太宗好“读书”,曾宣称:“朕无他好,但喜读书。多见古今成败,善者从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⑪李昉所谓“鉴照古今”论,正与宋太宗读书乃为“多见古今成败”之目的相合,是将小说与正统史传等量齐观。宋前认为史传“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⑫,于国家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⑬,于个人则可以了解前人嘉言懿行以鉴照得失,修身养性。宋人对史传价值的认识亦未超越此认知,如编撰《资治通鉴》的司马光认为史传的价值在于“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⑭。此种史识,与李昉对《太平广记》的定位大体相符。从文献学角度而言,自《太平广记》始,两宋约三百二十年间,“雅、俗”两个文化层出现约六十二部小说选本与总集,其中不乏高质量者,如晁载之《谈助》、《续谈助》,刘斧《青琐高议》,曾慥《类说》,洪迈《夷坚志》,蔡蕃《鹿茸事类》、《鹿茸文类》,皇都风月主人《绿窗新话》,罗烨《醉翁谈录》等。宋前则仅七部小说选集,即汉刘向《百家》、南齐焦度《稽神异苑》、南梁殷芸《小说》、佚名《杂书抄》、唐陈翰《异闻集》、张敦素《夷坚录》。两相对比,即可知宋代小说选本与总集编纂之盛况,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太平广记》的垂范。

在古代,文化观念的形成一般由上层社会流衍到下层社会。《太平广记》成书后,即在一定范围内流传着^⑮,产生过一定影响,其帝王之学的文化范式,渐进为有宋一代小说认知“德性”自觉的深层文化心理。如曾慥编《类说》,乃追踵《太平广记》的典型,其序言《类说》乃“集百家之说”,“可以资治体、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⑯。此种观念,在其他宋人的小说选本(或总集)中多有体现。如张邦基《墨庄漫录》自跋言“所书者必劝善惩恶之事”^⑰,陈晦《清波杂志跋》言“感时怀旧,奖善黜恶,断断然有补风教”^⑱,钱明逸《南部新书序》言“事无纤巨,善恶足为鉴诫者,忠鯁孝义可以劝臣子,因果报应可以警愚俗,典章仪式可以识国体,风谊廉让可以励节概”^⑲,等等。如此言说,并非被动“德性”之自饰,而是“德性”的主动自觉。

宋人小说创作更是融贯“德性”自觉,不仅体现在“垂诫”性文字构成文本叙事的有机部分,且文本叙事往往围绕“德性”展开。如《绿珠传》云“非徒述美丽,窒祸源,且欲惩戒辜恩背义之类”^⑳,《杨太真外传》云“今为外传,非徒拾杨妃之故事,且惩祸阶而已”^㉑,《李师师外传》则传达了著述者对李师师的高度评价:“李师师以娼妓下流,猥蒙异数,所谓处非其据矣。然观其晚节,烈烈有侠士风,不可谓非庸中佼佼者也。”^㉒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此类“垂诫”性文字也存在于唐传奇中,但唐传奇中此类文字所张扬的“德性”常与叙事脱节,且非普遍存在。在宋传奇或

笔记小说中则是文体的构成部分,其阐释的“德性”往往是故事的宗旨,是叙事的指归。宋代小说在“德性”自觉方面超越唐人小说之处,在于“德性”已内化于叙事进程中。以情爱题材而言,唐传奇多写得恣肆张扬,如《游仙窟》、《柳毅传》、《李娃传》等;宋人则写得含蓄蕴藉、羞羞答答,如《温泉记》、《绿珠传》等。又苏轼《东坡志林》卷一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恶,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辄蹙眉出涕;或喜唱快,自非叙事之后进行生硬说教,而是通过高超的说话技艺将“垂诫”融入叙事之中,从而达到“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②的效果。此外,宋人在书目的“小说”类中还收录训诫类著作,如《崇文总目》“小说”类收入《颜氏家训》、《诫子拾遗》等;《新唐书·艺文志》“小说”类收入《家范》、《诫子书》等。

宋代小说文化观的“德性”自觉,对小说“德性”本体追求有深远影响,集中体现在明清两代小说著述和批评中^③。延及近代,小说的“德性”追求并未减弱,如“新小说”家创作小说,“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④。特别是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提炼出小说具有“熏”、“浸”、“刺”、“提”四种“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因此提出新国新民之“新小说”,并将小说视为文学之最上乘^⑤。其论之提出虽从明清小说的接受影响总结出来,但也是宋人小说文化观的延续与赓扬。所不同者,在于宋人小说的“垂诫”是传统的“圣人之道”,而梁氏的四种“力”在于打破传统,宣扬革新思想。对宋人小说“德性”自觉的影响评价,程毅中《〈宋代传奇集〉序》言:“自兹而后,小说一家,蔚为大国,可以兴观群怨,或且优于诗赋。”^⑥堪称知言。

二、“稗官小说家言不必信”宋人小说史学观

在传统小说思想中,史学观念始终纠缠着小说的艺术精神,即便是明清章回小说,小说家依然将小说附丽史传以获取生存空间,小说批评家则多依史法、史意评点小说。史学观念对小说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劝惩的“史识”与记录的“史才”两方面。宋人小说思想中的“劝惩”观念,已经内化为文化层次的“德性”自觉。然而与宋前小说著述大体以“实录”为价值取向相比,宋人小说思想中虽也有“实录”观念,但其实质是“稗官小说家言不必信”^⑦的小说家法。

中国古代小说长久附丽于史传,史传实录标准也就成为其评判原则之一。采录各种传闻以成小说也是古代的一种传统,但也在潜在约束下形成采录过程中“传信”或“传疑”的两难抉择。宋人在理论上看重“传信”,甚至以“传信”相标榜。如钱明逸在为其父钱易《南部新书》所作序中称其书:“其间所记,则无远近耳目所不接熟者。”^⑧然强调“传信”之际,宋人也并不否定小说亦可“传疑”的特性。如张湜《云谷杂纪》卷一谈及刘向《新序》所载“晋平公浮西河中流”事与《说苑》所载“赵简子游于河”事,云:“二书皆刘向所辑,二说相类如此。疑本一事,所传不一,故有简子平公之异,向两存之,岂示传疑耶。”^⑨刘向《新序》与《说苑》皆为传统小说集,张湜此言从源头追寻“传信”与“传疑”在小说中存在的合理性。作为史学家的欧阳修,也曾传信与传疑间徘徊,如《归田录》卷二说:“(赵志忠)既而脱身归国,能述敌中君臣世次、山川风物甚详。又云阿保机辽人实谓之阿保谨,未知孰是。此圣人所以慎于传疑也。”^⑩然“传信”有可能招致怨尤。因此,宋人在小说著述的实际过程中,采取“疑以传疑”的立场。洪迈《夷坚志序》所载一事或可说明:“在闽泮时,叶晦叔颇搜索奇闻,来助纪录。尝言:‘近有估客航海,不觉入巨鱼腹中。腹正宽,经日未死。适木工数辈在,取斧斫鱼胁。鱼觉痛,跃入大洋。举船人及鱼皆死。’予戏难之曰:‘一舟尽没,何人谈此事于世乎?’晦叔大笑,不知所答。予固惧未能免此也。”^⑪洪迈小说著述的传疑并非特例,实是宋人的一种普遍倾向。如刘斧《青琐高议》所收宋人传奇小

说,无论是史官乐史,还是文人钱易、秦醇,固多采古事以成小说,但对古事的结构则与史传叙事有本质区别。传奇小说与史传对于记事的区别在于:“惟传奇之言行情节可决之于作者,而史传之言行必决之于文献。史家苟滥用文献,则其所作,等同传奇可也。”^③宋人采古事的传奇小说虽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但这些事又都是宋人“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④,即便是“传信”,也非史家征实之录。郑樵《通志·乐略·琴操》中的一段话正点出宋人小说叙事思想与史传叙事相区别的实质:“又如稗官之流,其理只在唇舌间,而其事亦有记载。禹舜之父,杞梁之妻,于经传所言者,数十言耳,彼则演成万千言。东方朔三山之求,诸葛亮九曲之势,于史籍无其事,彼则肆为出入。”^⑤郑樵点出宋人小说创作方法是“敷演”法,即能将经传典籍的“数十言”敷演出“万千言”。在中国传统阐释学中,经传的阐释是主流,其中也有故事性的阐释,如《韩诗外传》对《诗经》的阐释,但此种阐释是补足经传,验证经义,以经义为本位,实质是“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⑥。郑樵所谓“敷演”,则是小说家只取经传的一点因由,演义出与经传经义无涉的故事,是以故事为本位。特别是“于史籍无其事,彼则肆为出入”的概括,明确了宋人小说叙事与史传叙事的本质差别。

此外,宋人对小说的价值定位,在“圣人之道”、“垂诫”、“助缘情之绮靡”外,还有曾慥《类说序》中所谓“供谈笑、广见闻”的娱乐性^⑦。如欧阳修《归田录自序》云:“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⑧王闿之《澠水燕谈录自序》云:“蓄之中囊,以为南亩北窗、倚杖鼓腹之资,且用消沮志、遣余年耳。”^⑨此外还有如《林下笑谈》等谐谑小说和晁载之《谈助》、《续谈助》等小说选集等。“供谈笑、广见闻”的价值取向,为宋人进行小说叙事提供了展闪腾挪的空间。传闻,无论真实与否,关注的是“事”本身,是简单的按照事件发生发展的逻辑顺序展开,没有小说叙事时间的变异,如叶晦叔讲述估客入巨鱼腹中事,然宋人小说家对传闻的关注,则是“事”的娱乐性,利用“事”成为传闻的过程结构小说,利用叙述的“真实”与“虚构”的矛盾,生成事的娱乐性,如叶晦叔讲述估客入巨鱼腹中事时主对客的“戏难”。

娱乐性追求与“德性”自觉结合,让宋人小说易于从实录观念的史统中脱身。综观宋人小说,可发现无论是古事还是近事,皆以鬼魅与情爱题材为主。宋人小说中的鬼魅灵异题材,并非纯粹张皇鬼神、称道灵异的志怪,而是借鬼魅灵异世界折射现实世界的人情冷暖;至于情爱题材,则显然是在“德性”自觉指引下的世俗情感的悲欢。如《青琐高议》中《异鱼记》、《朱蛇记》、《仁鹿记》所载灵异故事,实寓有现实世界的道德关怀,而《远烟记》、《越娘记》、《长桥怨》、《书仙传》等情爱世界,更是世俗的写照。以宋代小说发展里程而言,从早期《青琐高议》到晚期的《绿窗新话》有着明显的嬗变轨迹,前者书名还呈现作者刘斧“秀才”式的自矜,后者则完全是市井风月佳话^⑩。这一嬗变的形成,正与宋代城市娱乐生活的发展进程相适应^⑪。

宋人在文言小说领域还难以抛弃“实录”的面纱,但在“说话”中则背离了“实录”的束缚。宋人“说话”,至少“真假相半”,甚至“多虚少实”,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载:“凡傀儡,敷演烟粉灵怪故事、铁骑公案之类。其话本,或如杂剧,或如崖词。大抵多虚少实,如巨灵神、朱姬大仙之类是也……凡影戏,乃京师人初以素纸雕鏤,后用彩色装皮为之。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与之丑貌。盖亦寓褒贬于市俗之眼戏也。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⑫吴自牧《梦粱录·百戏伎艺》也有大体相同的记述,这表明,傀儡话本的故事类型和“说话”中的“小说”故事类型基本无二,傀儡话本“大抵多虚少实”,那么“说话”中的“小说”话本也应如是。又影戏的话本与“说话”中的“讲史书者颇同”,两者都是“大抵真假相半”。从此即可看出,宋人“说话”中的两大宗至少是虚实相半,突破了“实录”界限。因

此,宋人白话小说的艺术成就表现为:“说收拾寻常百万套,谈话头动则是数千回。”^④“讲论处不帶搭,不絮烦,敷演处有规模,有收拾。冷淡处提掇得有家数,热闹处敷演得越久长。”^⑤可见宋人小说叙事的虚构艺术已经自觉。宋人小说思想对于史家“实录”观念束缚的突破所具有的近代性,施蛰存曾总结说:“上古文学以散文为大宗,中古文学以诗为大宗,近代文学以小说为大宗。凡是文化史悠久的国家,其文学史的发展,无不如此……近代型的小说早已出现于宋元时代。”又说:“宋元人所谓‘小说’,倒是接近于现代观念的。”^⑥

三、“丹青摹写”与“助缘情之绮靡”——宋人小说文学观

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文学应具有“劝善惩恶”之功用的观点至迟在汉代已明确提出。如王充《论衡·佚文篇》云:“天文人文,文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愿载,力自禁载。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⑦宋人在小说中张扬“奖善黜恶”的“德性”自觉,实则也是“文人之笔”,是以“德性”为本位的文学性追求,即“旨趣渊深”与“华饰文章”并重^⑧。正因此,宋人能够在唐人小说创作与认识的基础上更深入地以艺术精神认知小说的文学之美。

第一,这体现在对小说语言的文学性认知从自发到自觉的变化。如宋初无名氏刻祖冲之《述异记》,其序称《述异记》“文词怪丽之端”^⑨。“怪丽”之语,在中国文论话语体系中,大抵用来指称诗词歌赋的文词审美特征,与“巧丽”、“奇丽”内涵大体相近。言《述异记》“文词怪丽”,是对其语言审美特征的概括。大约在无名氏刻《述异记》的庆历四年前后,张君房编选《丽情集》,所谓“丽”也是就语言的审美而言。成书于庆历六年的《岳阳楼记》,在本年或次年即被古文家尹洙(按:尹洙卒于庆历七年)鄙评为“传奇体”,缘于此文“用对语说时景”^⑩,也即着眼点在《岳阳楼记》与裴铏《传奇》相似的语言特点。庆历年间对小说语言的文学性认知,大体而言并非主动自觉,庆历之后则已成为自觉,如赵令畤、赵彦卫、刘辰翁、罗烨等人对小说语言的理论阐释。赵令畤谓《莺莺传》乃“大手笔”之作,理由有二:首先是以“絨书诗章”之“词彩艳丽”的语言美来刻画莺莺的“才华宛美”,此是语言的静态美;其次是《莺莺传》语言的动态表现能力令莺莺“都偷淫冶之态”“飘飘然仿佛出于人目前”,其高妙处即使“丹青摹写”亦不能与之相媲美^⑪。赵彦卫则总结唐传奇小说的文体特征之一为“诗笔”^⑫,这不仅针对唐传奇小说中多诗词韵语而言,更是对唐传奇小说作者运用具有诗意诗趣的语言来“摘词布景”,从而形成对“有翻空造微之趣”^⑬的总体面貌的赞誉。刘辰翁评点《世说新语》^⑭,亦多着眼于小说语言艺术旨趣的揭示,如对“何晏七岁”一则评云:“字形语势皆绘,奇事奇事。”^⑮又如评作品的叙述语言为“语烦”^⑯、“高简”^⑰,评人物的口语特色为“常语”^⑱、“口语”^⑲、“市井笑语”^⑳;评人物语言的感情色彩为“语鄙”^㉑、“情真语快”^㉒、“语意疏直”^㉓、“钟情语”^㉔、“注情语”^㉕、“答故当俳”^㉖、“语甚感动”^㉗、“语甚可悲”^㉘。罗烨则认为小说“说与东西南北人”,强调小说语言应“以上古隐奥之文章,为今日分明之议论”^㉙,具体而言,就是要掌握“说话”的语言才能,即“论才词有欧、苏、黄、陈佳句,说古诗是李、杜、韩、柳篇章”能“曰得词,念得诗,说得话,使得砌”^㉚。

第二,宋人开始从人物形象着手探讨小说的艺术特点。前引赵令畤评价《莺莺传》出自“大手笔”,盖赵令畤认为元稹充分运用艺术的语言塑造鲜活逼真的莺莺形象,以致“丹青摹写”亦不能及。刘辰翁评点《世说新语》亦能抓住作者以玄远冷峻之言与高简瑰奇之行所展示的人物风态,以“点睛之法”指出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特色与所达到的艺术效果^㉛。刘辰翁之评点,常以“甚有情致”^㉜、“俯仰情至”^㉝、“大是乖汉”^㉞、“是道人语”^㉟、“神情自近”^㊱、“委曲细碎可观”^㊲等

语评价其所塑造人物形象的特征。罗烨在《醉翁谈录》中总结话本小说的艺术成就有云:“说国贼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心肠也须下泪;讲鬼怪令羽士心寒胆战,论闺怨遣佳人绿惨红愁。说人头厮挺,令羽士快心;言两阵对圆,使雄夫壮志。”^①

第三,宋人对小说文体有较为自觉的理论探索。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言小说的文体独立,然唐人并未对其文体进行理论总结。在唐人创作实绩与宋人对小说的认知基础上,赵彦卫对唐传奇进行了总结:“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②此段文字不仅较精确地概括出唐传奇“文备众体”诸要素,还阐明唐传奇文体发生的社会基础。洪迈言:“大率唐人多工诗,虽小说戏剧,鬼物假托,莫不宛转有思致,不必专门名家而后称也。”^③此语在点出小说的虚构性时,还以“宛转”与“思致”概括小说含蓄且有趣味的特征。刘辰翁评《世说新语》有云:“如此细事,写得宛至,更看不厌。”^④以此揭明小说含蓄有趣味的特征。可以说,这些评论的核心皆是小说文体的构成要素,亦能代表宋人对小说文体的总结。

第四,宋人对小说与诗词关系的认知上亦表明宋人的小说观。在宋人创作中,诗与小说在语言、材料和文体等方面皆可互通。诗与小说的互通,在唐代即已发生,但前提是唐人在一定程度上视小说为史传,故实则是诗与史传的互通。但在宋人看来,小说仍是小说,而非史传。如傅自得序叶廷珪《海录碎事》称其所录“大抵皆诗才”,时人作“食以饴口,怠以饴神”之诗,得“此书之力为多”^⑤。宋佚名刻任昉《述异记》,盖因其认为《述异记》“可以助缘情之绮靡,为摘翰之华苑者矣”^⑥。张君房编“古今情感事”^⑦的《丽情集》,正是宋人以小说“助缘情之绮靡,为摘翰之华苑”的典型例子。《丽情集》编订成书后在士大夫中流传甚广,当时名流俊彦如苏轼等,作诗词著文章,多从《丽情集》中撷取典故^⑧。小说有益于诗,在宋代并非个案,而是风尚。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宋仁宗天圣七年事曰:“庚申,诏曰:‘朕试天下之士,以言观其趣向。而比来流风之敝,至于荟萃小说,磔裂前言,竞为浮夸靡蔓之文,无益治道,非所以望于诸生也。’”^⑨宋士人“荟萃小说”的风习,竟蔓延到皇帝选拔士人的考试中,并促使皇帝下诏禁止科举中以“小说”语言相夸饰,足见此风之盛。

总而言之,小说与诗歌属于两种不同的文体,具有不同的品性。小说“纵横四海,驰骋百家”^⑩,诗歌则强调思与境偕。如以“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小说家言进入诗歌,可能弱化诗歌的诗性。然宋人做诗词多取资小说,足见他们认识到小说语言与事典的艺术精神。宋人对小说文学性的认知,大体而言是将对“文章”的艺术认知成功地移植到小说,从而引领了明清乃至近代小说的艺术精神^⑪。可以说,宋人之“始有意治小说”,在小说思想史上介于传统与近代之间,与唐人之“始有意为小说”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① 康来新:《发迹变泰——宋人小说学论稿》“绪论”,台北大安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② 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云:“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607页。朱弁《曲洧旧闻》卷九云:“《新唐书》载事倍于《旧》,皆取小说。”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17页。

③③③ 欧阳修:《归田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4页,第22页,第3页。

④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1页。

⑤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页。

⑥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页。

⑦⑧⑨ 《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244页,第1745页,第1745页。

⑩ 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6页。

⑪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6页。

⑫ 刘知几著、张振珮笺注《史通笺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1页。

⑬ 刘勰:《文心雕龙》,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6页。

- ⑭ 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资治通鉴》，第9608页。
- ⑮ 钱钟书：《管锥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39—641页；张国风：《〈太平广记〉版本考述》，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10页。
- ⑯⑳ 曾慥：《类说》，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版，第29页，第29页。
- ㉑ 张邦基：《墨庄漫录》，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81页。
- ㉒ 周辉：《清波杂志》，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32页。
- ㉓㉔ 钱易：《南部新书》，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页，第1页。
- ㉕㉖㉗㉘㉙ 李剑国辑校《宋代传奇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7页，第33页，第915页，第1页，第453页。
- ㉚ 苏轼：《东坡志林》，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页。
- ㉛ 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叙》，冯梦龙编《古今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页。
- ㉜ 参见陈美林、李忠明著《中国古代小说的主题与叙事结构》第二章第二节，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方正耀著、郭豫适审订《中国小说批评史略》第二编第二章《小说传道的倡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 ㉝ 任公：《译印政治小说序》，《清议报》1898年第1册。
- ㉞ 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0—53页。
- ㉟㊱ 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67页，第1818页。
- ㊲ 张淏：《云谷杂纪》，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页。
- ㊳ 汪荣祖：《史传通说——中西史学之比较》，中华书局2003年，第53页。
- ㊴ 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中华书局1975年影印明崇祯十四年贯华堂刻本。
- ㊵ 郑樵：《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911页。
- ㊶ 章学诚：《文史通义》，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页。
- ㊷ 王闿之：《渑水燕谈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页。
- ㊸ 孙副枢《青琐高议序》言刘斧为秀才，《绿窗新话》署名为“皇都风月主人”。
- ㊹ 宋代城市娱乐生活的发展对于文艺的影响，法国人谢和耐著，刘东译《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一书有较为详细论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 ㊺ 孟元老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86页。
- ㊻㊼㊽㊾㊿ 罗烨编《新编醉翁谈录》，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第4页，第3页，第4页，第4页，第1页。
- ㊽ 施蛰存：《西学东渐与外国文学的输入》，载《中国文化》1991年第5期。
- ㊾ 王充：《论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14页。
- ㊿① 无名氏刻《述异记》有《序》与《后序》，都载于清光绪年间南陵徐氏随舛刊本《述异记》，后序自言作于宋庆历四年（1044）中秋望日。
- ② 陈师道：《后山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86页。
- ③ 赵令畤：《侯鯖录》，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42页。
- ④⑤ 赵彦卫：《云麓漫钞》，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35页，第135页。
- ⑥ 桃源居士：《唐人小说序》，侯忠义编《中国文言小说参考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页。
- ⑦ 潘建国：《〈世说新语〉元刻本考——兼论“刘辰翁”评点实系元代坊肆伪托》一文认为“刘辰翁”评点为元代伪托，载《文学遗产》2009年第6期，可备一说。但笔者认为如无更有力证据，还应依旧说为是。
- 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刘义庆撰、刘孝标注、朱铸禹汇校集注《世说新语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05页，第447页，第408页，第67页，第102页，第617页，第7页，第39页，第64页，第109页，第130页，第142页，第250页，第344页，第58页，第82页，第163页，第325页，第423页，第276页，第42页。
- ① 杨庆存：《论宋元小说批评的开拓与发展》，载《齐鲁学刊》1986年第1期。
- ② 洪迈：《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页。
- ③ 叶廷珪：《海录碎事》，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页。
- ④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97页。
- ⑤ 参见赵维国《论〈丽情集〉与宋代丽情小说创作》，载《河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946页。
- ⑦ 参见谭帆《“小说学”论纲——兼谈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批评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作者单位 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学报编辑部）

责任编辑 山木